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七八期 ——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一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12a)

---

【回首文革】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熊 蕾
【荒唐岁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	徐秋梅·吴继金
【史海钩沉】	“文革”重灾之下的昆明军区	尹家民
【当事者说】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王广宇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回首文革】

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

• 熊 蕾 •

没有华国锋和叶剑英的联手，就不可能有粉碎“四人帮”的历史举动。然而，记述当年粉碎“四人帮”过程的文章有很多，对华、叶是如何走到一起来的，却都语焉不详。

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促成这段历史的那个人，是老爹熊向晖。

此外还有叶帅的侄子叶选基和女婿刘诗昆——对，没错，就是那位钢琴家。

而我和家兄，也是这段历史的见证。

在1976年那个非常年代，我们早已走上工作岗位。老爹对我们的政治态度很放心，也知道我们嘴巴比较紧，因此好多事情不再像对我们小时候那样守口如瓶了。

◇ 华国锋是谁？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在人们为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位总理去世而悲痛的时候，心中也压着巨石般沉重的未知：谁来接替总理的位置？

本来，这个问题很明了：当时众望所归的邓小平。

然而，明眼人都能看出，从1975年秋开始，邓小平已经再次地位不稳。他在一些重要场合的讲话中毫不隐讳地否定“文革”，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并招来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这些党内极左派头面人物的批判。这些人前些时候虽然也因被毛主席批评沉寂过，但是周恩来病重辞世以及邓小平反“文革”的一些言行，给了他们再次兴风作浪的机会。

这次“批邓”的势头很猛。宣传机器本来就掌握在极左派手里，加上他们善于造势，评《水浒》批宋江的运动很快就矛头直指“党内那个最大的走资派”了。不久，“最大的走资派”升级成为“不肯改悔”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加上北大、清华校园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在这样的形势下，邓小平接任国务院总理，除非是奇迹出现。

邓小平既出局，按当时国务院副总理排位的顺序，很可能就是张春桥了。

很多人在揪着心，看张春桥这个阴沉极左的人会不会登上总理的位置。

那可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人哪。果真他上来，老百姓就不会有好日子过。

在人们的悬念中，毛主席提名任命华国锋为国务院代总理，经政治局同意，在1976年2月3日公布。

这个任命，出乎所有关注此事的人们的意料。这不仅因为华无论在国务院副总理的排序还是党内的排序中，都在张春桥及其他好几人之后，而且也因为在北京的高层干部几乎没有人认识他。

老爹们在庆幸大权没有旁落到张春桥这样的人手里的同时，心中也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华国锋是谁？他是什么人？

最关键的是，他“是不是他们那一伙的”？

谁也说不上来。

◇ 初识华国锋

从简历上，可以知道时年55岁的华国锋是山西省人，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一直在湖南工作，1970年“文革”高潮中开庐山会议，之后从湖南省委书记、“文革”后的省委第一书记任上调到中央。1972年谢富治死后接任公安部长。1975年，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但是，这个简历却无法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他是倾向江青那一伙的，还是反对他们的？

这在1976年的中国政治格局中，非常重要。

由于文革的原因，当时中央领导层形成了两个泾渭分明的派别：以江青一伙靠文革中造反上来的极左派，和被封为“保守势力”的务实派。务实派，主要由那些在文革中起起伏伏的“老家伙”们组成。极左派总是靠冲冲杀杀来谋求并扩大他们的权力，搞得民不聊生；而务实派比较关心国计民生，希望国家稳定。

周恩来病重不能视事后，邓小平成为党内务实派的核心人物。可是他的政治地位不保之后，极左派的气焰就嚣张起来。

现在上来了这个大家都不认识的华国锋。他的政治倾向，自然令人关心。

在老爹们的疑惑中，时间进入了4月。

首都群众利用清明节，自发去天安门广场送花圈，表达对周总理和其他先烈的哀思，发泄对极左派们的不满，惊天动地。最后的结果，是邓小平的彻底下台，和华国锋的再度擢升：国务院总理不再是“代”任而是实职，同时成为党中央的负责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这个1976年4月6日公布的任命，再次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批邓”已经公开。中央和国家机关都要批——当然有很多是认认真真做样子，基本只限于自己的机关大院之内。唯有时任外交部长的乔冠华，率领外交部人员到王府井游行，高呼“打到邓小平”，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就在这个时候，杨振宁要来北京。

就是那个得过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博士。

周总理生前非常重视这些美籍华人科学家的工作。他们来，总理都要尽量安排会见谈话。

如今，总理不在了，这个工作如何做？

杨振宁的来访，早在1976年1月就由几个部门做出了计划，并已请示中央同意。当时华国锋是主管科学院的副总理，杨振宁来了自然由他见；杨还提出见毛主席和邓颖超，中央当时也同意了——几个月前另一位得过诺奖的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来时，毛主席曾见过他并谈了话。

短短两个多月，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华国锋已经成为国务院总理。如果按原来的安排见，那杨振宁就成为他担任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负责人之后所见的第一位客人。而杨既不是国家元首也不是政府首脑，华第一个见他是否合适？如果华不见他，又该谁来见他？同时，毛主席还能不能见杨？

负责接待杨博士的老爹就这些问题，给华国锋的秘书打电话请示。

按照安排，4月15日，邓颖超见了杨振宁及杨母和妹妹。对那次见面，老爹有专文记载，

题为《邓颖超向杨振宁谈周恩来》，收入其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这里不再赘述。

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老爹当晚10点去汇报杨振宁来访情况，并提出陪见人员名单以及主席是否见杨的意见。

晚10时，老爹到了人大会堂。但是政治局还在开会，直等到17日凌晨2时许方才开完，华国锋才能过来。老爹向他汇报了邓颖超会见杨振宁的情况。也谈到杨来北京前，先到上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文革时取消了市长的职务，市政府都为革委会取代）的徐景贤见了，跟他大谈“批邓”，并送给他上海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我的箱子装满了。他对“批邓”也不表态。

这时，华国锋开腔了：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

关于他见不见杨振宁的问题，他也谈了自己的意见：原来安排是我见，如果我不见，谁见呢？——按照新的排位，华国锋的下面，就是张春桥。显然华国锋不倾向让张春桥来见杨振宁。

关于陪见问题，老爹说他不参加。华问为什么。老爹说，如果他参加，科学院方面势必就会让核心组的一个造反派参加，此人在科学家中的名声很不好，肯定是杨振宁不愿意见的人。老爹不陪见，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华于是问杨振宁跟哪些人熟？

老爹说，科学院的吴有训、张文裕，北京大学的周培源。

华说：那就是吴有训、张文裕、周培源，吴有训是科学院的副院长嘛！

确定了这些科学家陪见之后，老爹参加陪见就没有障碍了。他和这些科学家也都很有感情。

参加接待的还有外交部。华问杨振宁和外交部什么人熟？老爹说，那就是乔冠华了，1971年乔冠华去联合国时，请杨振宁吃过饭。华于是确定乔冠华也参加陪见。

华同时决定，考虑到毛主席的身体情况和工作情况，这次毛主席就不见杨振宁了。为此，华当即提笔，起草了一个给中央的报告。

当晚9时30分，华国锋在人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杨振宁，谈话至11时20分许结束。将近两个钟头的谈话，没有谈一个字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只有一处谈到了天安门事件，却完全没有按当时的主调说邓小平是后台。他只是说，抓起来的人里，有一个“文革”时期外交部造反派的儿子；这个人其实是反总理的。

初次和华国锋的接触，给老爹印象深刻。虽然两人并没有做任何推心置腹的交谈，但是老爹从这次短短的接触中已经做出判断：华国锋不是极左派一伙的！

◇ 叶帅请病假

这之后，又经过几件事，老爹对华国锋的印象更加清晰。

1976年5月底，叶帅的侄子叶选基来找老爹，老爹把自己对华的印象告诉了他。

老爹和叶帅的交情，始于1969年。当时他奉周总理之命协助陈毅、叶剑英、聂荣臻、

徐向前这四位老师研究国际形势。那次研究的结果，成为打开中美关系的前奏，也使老爹和四位老师结下刎颈之交。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后，邓小平眼看地位不保，叶帅心情非常不好。1月21日下午，叶帅来电话约老爹到他那里谈心。

在谈话中，叶帅讲到，周总理的追悼会，是他提出让邓小平致悼词，以此再给他一个在全国人民面前亮相的机会，想再扶他一把。现在看来还是不行。而政治局“批邓”，越批越凶。江青已经几次在叶帅不在的场合讲，她有两个敌人，一个是四川——指邓，一个是广东——指叶。她要先打四川，再打广东。现在四川已经不在话下，就剩广东了。

叶帅感到政治局的“批邓”让他很为难：参加吧，没话好说，不说话呢，又不好办。家人建议他到南方，到广东去休息。叶帅自己想去广西。他征求老爹的意见。

老爹问叶帅，江青的讲话是否确实。

叶帅说，确实，就是在政治局讲的。已经有几个在场的人向他透露。

老爹又问叶帅，如果他去广西，军委怎么办？

叶帅说，军委他还可以掌握。

于是老爹说，叶帅你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看，他们要整你，你到广西也逃不掉。他们要的不是你这个人，而是你的位置。我建议，你就学三国时刘备的韬晦之计，请病假，但是不要离开北京。这样，可进可退。

叶帅深以为然，说，这个意见好。

有些记述叶帅在1976年的文章说，叶帅是奉命“休息”。这不符合事实。当然，从当时的宏观政治形势来说，叶帅请病假是出于无奈，但是请病假本身，确实是叶帅自己提出的。

2月8日晚，叶帅再次找老爹去他那里深谈。他说，他接受了老爹的建议，跟聂帅商量以后，就打了报告给毛主席，请病假。已经得到了政治局的批准。关于华国锋为代总理的任命，叶帅说，这个措施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虽然王洪文告诉他，毛远新传达毛主席关于人事安排的指示时，说这是暂时的，但是叶帅认为，可以肯定的是，毛主席不想让江青、张春桥和王洪文他们接班。他虽然不了解华，但是已经给主席写信，拥护对华的任命。

4月2日晚，叶帅又一次找老爹去谈话。叶帅说，他请病假以后，杨成武、王尚荣还经常向他汇报工作，叶帅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恐怕他们不方便。近来，已经很少有人看他了。叶帅说：你现在还信任我，我很感激。说着就流出了眼泪。

老爹说：叶帅，你不能这样讲，首先是你信任我啊！老爹跟叶帅讲了王震的牢骚：关键时刻，元老、重臣都不讲话了。老爹说，虽然他讲得有些片面，但是这说明老同志对叶帅是非常尊重的。老爹告诉叶帅，他和王震一起去看聂帅时，聂帅说：决战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现在还不知道。不过聂帅也希望叶帅给毛主席写信。这表明在元老、重臣中，大家是以叶帅为首了。

叶帅说，这些意见都对，但是我担当不了啊！

老爹说，现在就要用到毛主席当年给隐蔽战线制定的方针：精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这两次见面时，老爹还没有接触到华，没有跟叶帅谈到这个方面。叶帅认为在这个非常时期，老爹到他那里会引人注目，多所不便，以后还是让他的侄子选基到老爹这里来，沟通消息。

#### ◇ 向叶帅挺华

老爹在5月底和叶选基谈过他对华国锋的印象之后，6月4日晚，叶选基和刘诗昆一起再次来找老爹。选基说，华国锋现在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叶帅长期在家里休息也不好。希望老爹向叶帅提出见见华国锋。

老爹说，这个意见很好，你们是不是向叶帅提过？

选基说，这个话我们不好提。如果熊叔叔认为可以，请你向我伯伯提。我们说话没分量。

老爹答应约个时间去跟叶帅谈。

6月7日晚，选基来接老爹一起去叶帅在西山的住地。

在谈了其他问题之后，老爹把话题扯到华国锋身上。他对叶帅说，选基和诗昆的意见很好啊！

叶帅说，华国锋长期在地方工作，调到中央以后，他和华不过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老爹说话，从来不是仅凭个人印象，一定要有根有据。这次要向叶帅挺华，更是有备而来。他特地带了两个材料给叶帅看。

第一个材料是1975年9月26日，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的说明。这是1975年11月，老爹向他当年清华的同学、当时在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李昌要来的一份打印件。老爹主要想看看邓小平听汇报时，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汇报的记录稿，有很多人的插话。老爹那时并没有注意当时作为主管科学院工作的副总理华国锋也有一段插话。华国锋担任总理后，老爹想起这个茬，把这个记录稿又找出来看。一看，果然有收获。

他把这个记录稿交给叶帅，特别请他注意华国锋的这段插话。

这段插话中，华国锋讲了三大革命、四个现代化都要靠科学技术现代化，科学院整顿很有必要；讲到依靠工农是对的，可是把专业队伍搞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不得不离开实验室。他特别对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事表示不满，说，毛主席对李政道、周培源讲了，周培源写了文章（关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人民日报》不发表，《光明日报》发表，跟着就批。这种批判基础理论研究的风，搞得科学家都不敢搞基础研究了；科技人员不敢看外国书，思想有顾虑。他还对当时极左派鼓吹的上海经验提出质疑：他们搞“三突”，学上海的经验，学那个？！

老爹跟叶帅说：你看，这些话很尖锐啊！

第二个材料，就是4月17日华国锋和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这个记录稿是华自己改定的。

老爹说，华国锋刚当总理不久，和杨振宁谈了近两个钟头，没有一句“批邓”，也没有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后台，只批了外交部那个造反派的儿子。这就不简单了。

然后老爹给叶帅讲了两件事。

一件是公安部副部长李震死亡的定案问题。李震是1973年10月21日在家中死亡。对他的死因，有两种意见。公安部门勘察认定是自杀，王洪文以及公安部另一负责人却认为是他杀，是谋杀。当时，很多认为李是自杀的公安干部遭到整肃。华国锋主持国务院工作之后，这个事情还没有结论。老爹参加了华主持讨论这个问题的国务院会议。他发现，作为主持人的华，不是坐在那里听，而是谁发言，他就站在发言人的后边听，既不插话，也不问话。有人说自杀，有人说他杀，就这么说了一夜。之后，他问，还有人要说吗？没有，散会。第二次再开会时，他把两边的意见归纳几点，说他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说自杀的有几点什么理由。然后，他让主张是他杀的人再讲讲他们的理由，接着让主张是自杀的人反驳这些理由。结果，他杀的理由都被驳倒。最后，华国锋说：这样看来，是自杀吧。还有什么意见？谁也说不出什么意见来了。

另一件事，是在关于李震死因问题的第二次会议散会之后，大家在往人大大会堂外面走时，华国锋叫住老爹，问：怎么好久不见老罗了？

老罗是指罗青长，周总理时的总理办公室副主任，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他是老爹的老战友。

老爹说：他病了。——罗叔叔本来心脏就不好，天安门事件后，他在七机部工作的大儿子和大儿媳双双被隔离审查，更加重了罗叔叔的病情。

华问罗叔叔住在哪里。老爹说，在阜外医院。华问：怎么不住北京医院呢？老爹说，文革调整了他们的医疗关系到阜外医院，想住北京医院，可住不进去。

这时，他们已经走到大会堂外面。听了老爹的话，华国锋站住，说，要住北京医院。说着，就在人大大会堂外面的台阶上坐下来，从公文包中拿出一张纸，写了个条子：北京医院并报（卫生部）刘湘屏部长，安排罗青长同志住院。

就这样，罗叔叔住进了北京医院——他至今还健在。

老爹对叶帅说，他这个作风也很好啊！

叶帅听了以后，颌首说，这个人含而不露。

老爹说：我觉得华不错，不过他立足未稳，所以叶帅是否帮他一下。

叶帅表示，他会去见见华国锋。

听了老爹对华国锋的介绍，叶帅决定去见华。1976年7月里的一天，他们见了面。

◇ “九亿人民的元帅”

转眼一个月过去。传来的消息，毛主席身体时好时坏，反反复复。但是已经不能讲话了。党内的局势，依然表面上云山雾罩，下面却暗流汹涌。

7月28日，唐山地震。当天下午，叶选基来告诉老爹，叶帅已经和华国锋见过面——具体时间他没有讲，想来是7月间的某一天。

选基说，叶帅见过华后，说老爹“说得对，看得准”。叶帅说，华很稳重，应该支持。

叶帅要约个时间和老爹面谈。8月15日下午，老爹得到叶帅通知，到西山他那里见面。

地震之后，北京家家户户都搭起防震棚。叶帅那里也没有例外，院子里一东一西搭了两个帐篷，叶帅在东边那个帐篷里办公会客。

叶帅对老爹说：你对华国锋看得对。叶帅讲了7月1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毛主席病况的事。当天近夜时分，叶帅接到通知去参加这个会。极左派们，主要是江青，起草了一个下发各省部委关于毛主席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帅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这就和江青他们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1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帅有些纳闷。可等到叶帅看到那天凌晨两点钟发出的电文，乐了。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说，我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指华国锋）确实好，应该支持。我已经告诉王震了。

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他跟老爹详细讲了见面经过和他们谈话的内容。

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叶帅说，我想看看华总理。

华国锋说，我应该去看叶帅。听说叶帅患病，我也不好打搅。

叶帅说，你忙，还是我来看你。

争了半天，最后还是叶帅说服了华，去看他。因为叶帅觉得华出行的目标比他更大，还是他去华那里更为妥当。

华国锋住的地方，车不能开进院里。叶帅到时，华已经等在门口——那时候可还没有手机对讲机什么的，华只能估计时间提前在门口等。这个举动，令叶帅很欣慰。华国锋亲自为叶帅打开车门，然后扶着他走进院子，到客厅就坐。

叶帅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

华国锋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一句“九亿人民的元帅”，颇让叶帅动容。

寒暄之后，叶帅问了华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你现在治国的方针是什么？

华说：举一纲抓两目。

——举一纲，是阶级斗争为纲，抓两目，就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安定团结。在那个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提出“阶级斗争为纲”，是势在必然；而提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和安定团结，却常常被认为是右倾。

听华这样讲，叶帅说，好。



第二个问题是：周总理逝世了，董老、朱老总也都逝世了，中央人事安排你怎么考虑？

华说：除非主席有指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

叶帅说，好。

——要知道，当时极左派们正在紧锣密鼓，要从上海向中央各部委的领导岗位安插人员，人事问题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华明确提出人事问题一概不动，叶帅说好，是由衷的。

华国锋向叶帅请教应该注意的问题。叶帅告诉他，要注意民兵。解放军的传统是，指挥只能是一个，不能多中心。

——当时军委还在老师们的掌握之中，四人帮动不了军队，正在抓紧搞民兵。

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老爹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叶帅原话就是“巨眼”，而且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当天晚上，叶帅留老爹在他院中西边那顶帐篷里共进晚餐，还喝了茅台。

#### ◇ 决战临近

1976年9月9日0时10分，毛泽东主席逝世。

中央高层领导开始治丧活动，中央各部委和各地党政军领导继天安门事件后，开始又一轮向中央的表态。而中央高层的斗争，更趋激烈。

9月10日晚，老爹听我的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表哥讲，清华大学负责人迟群在学校讲话，说要准备“更尖锐的斗争”，要“五不怕”，并命令民兵随时听候调用。

老爹立即打电话给叶帅，报告这个情况。叶帅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动手。

9月18日，为全国追悼日。当天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召开了有百万人参加的追悼毛主席的大会。

此时，叶帅连日去政治局开会，也不用销假了。9月20日，选基来找老爹，告诉他一些新的情况：一次政治局讨论治丧的会议上，江青突然提出，第一，开除邓小平出党；第二，华国锋批林（彪）批孔（夫子）不积极，“批邓”更不积极，领导中央不得力；第三，暂时还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当即表示，不同意江青的第一点意见；不开除邓小平党籍，是主席的意见，主席提议，政治局通过，叶帅虽然没有参加这个会，但是认为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叶帅说，主席说的是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主席刚逝世就翻过来，这不行。但是叶帅赞成江青的第三点意见，就是仍然要团结在华国锋周围。叶帅一说完，其他政治局委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只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四个人不表态。

选基说，这也是个信号，是一次短兵相接的测验。如果在适当时机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应该也是这样的一种结果。

9月22日，选基和刘诗昆再次来找老爹谈。老爹问到叶帅究竟什么主张？他们说，叶帅要等主席治丧告一段落，再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准备批那四个人。早在1974年，主席与总理和王洪文在长沙谈话时，就指出江青有野心，后来指示要批“四人帮”，但是小平没有批下去。

在老爹与叶帅和选基的所有谈话中，一直都没有使用过“四人帮”的提法。提到他们，都是用代号：江青是“三点水”，张春桥是“眼镜”，姚文元是“文痞”，而王洪文则没有代号。偶尔也会用“上海帮”来说他们，但多数时候还是用代号。在很多谈话中，他们也探讨过最后处理“四人帮”的办法。大体上，都是设想通过政治局扩大会议，把他们选下去，然后把张春桥等调到外地，把江青架空，让他们没有实权。但是，具体何时操作，如何操作，后果如何，都是很大的问号。

正如聂帅所言：一场决战已不可避免。虽然这场决战在什么时候发生，以什么形式发生，大家还不知道，但是人们感到，决战已经临近。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 ◇ 一举除“四害”

在老爹们对决战的焦急期待中，人们度过了一个没有欢庆活动的国庆节。

1976年10月6日晚10时许，选基给老爹打来电话，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老爹心里还有点疑惑，马上又给叶帅的秘书王守江打电话。他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老爹说，他讲的四个坏蛋，是谁？王说：就是王、张、江、姚。老爹说，不要叫他们跑了。王说：跑不了啦！叶帅现在到玉泉山了，忙得很，可能过几天才能见你。

虽然还不知道是否大局已定，但是我们全家都兴奋得不行，好像长久压在心头的一块大石头被搬去了，感觉就是一个字，爽。

10月7日，有驻京部队机关总部开始传达“四人帮”被逮捕的事情。尽管中央和国务院系统还没有正式传达，但是这个消息还是迅即在北京不胫而走。

10月8日下午，邓颖超的秘书赵炜打电话给老爹，说邓大姐看了蔡大姐，似乎有什么重大新闻，究竟怎么啦，大姐让问你。老爹说，大姐还不知道吗？“四人帮”被逮捕审查了。赵炜告诉了邓颖超，又跟老爹说：大姐说，是除了“四害”。老爹说，对，“除四害”，妙极了！

10月11日，选基打电话让老爹去王震家里。在那里，他和刘诗昆讲了逮捕四人帮的经过。

选基说，主席去世后的一天，李先念突然来访问叶帅。从周总理去世后，叶帅一直期待着李先念的造访。老爹每次去叶帅那里，叶帅都提到，李先念还没有来，同时，也对李的处境表示理解。

终于见到李先念来访，叶帅问：是哪阵风把你吹来啦？

李先念说，是东风。

叶帅问：哪股东风啊？

李答：华总理。

叶帅说，我就知道，你这个人哪，无事不登三宝殿啊！没有人叫你来，你不会来的。让你来，什么事呀？

李说，是国家大事。他说，毛主席去世以后，他多次问华国锋，是不是开中央全会。开始华不表态，后来说，有他们四个人在开不了，就是开也开不好。李问，那怎么办？华国锋开始没有讲，后来就说，有人提议把他们四个人隔离起来。李说，这是好主意啊！华国锋说，这事太大，要请示叶帅。华要李先念亲自去请示叶帅。

叶帅听了，想了一想，说，只能如此，事不宜迟，要绝对保密。

选基说，这之后，叶帅与华国锋秘密商量，同时也有汪东兴参加（阎长贵按：汪不止一次讲，他们三个人也没一起开过会，都是单线联系——一个逢年过节去看汪的人），预先布置。首先是军队。陈锡联赞成这个行动。叶帅又亲自找军委三总部和各兵种可靠的负责人，如杨成武，分别交底。部队完全没有问题。公安部和警卫中南海的8341部队由汪东兴掌握，也没有问题。情报部门更没有问题。对“四人帮”掌控的广播电台、报纸，则准备了妥当的人接管。10月6日，一切就绪，采取行动。分别通知四个人来中南海开会，叶帅和华国锋坐镇，汪东兴负责实施，来一个抓一个。除了江青说有病不能来，其他三人都先后来，都被抓起来。当晚，汪东兴又带着部队去江青处把她也抓了起来（阎长贵按：汪未去，是张耀祠去的——一个问过汪和张的人）。

选基说，叶帅认为，现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爪牙已经关起来了，目前的方针是缩小打击面，扩大团结面。对各地已经打了招呼。叶帅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央主席，是新的领袖。

党内和社会舆论对这次除“四害”之举，高度一致：果断、干净、利落、漂亮。正如郭沫若那首诗的劈头一句：“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

#### ◇ 叶帅的希望

大局初定之后，10月31日，叶帅把老爹找去，做了一次长谈。

叶帅说，“英明领袖华主席”，是我提的。他当之无愧。

叶帅谈到要帮助华国锋：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华主席需要帮助。谁帮啊？首先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他没有挑别人啊，就挑了他嘛！毛主席说他有工作经验，忠厚，不蠢。“不蠢”这两个字很妙啊！大智若愚啊。稳重。第二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坚决支持华，特别是军队。第三是基层干部群众。粉碎“四人帮”，受到全体人民的欢迎。

在这“三个帮”中，叶帅认为，关键还是“我们这些老家伙”，要承上启下。

老爹和当时很多老家伙一样，希望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他跟叶帅讲了大家这份心情。

叶帅说，小平是要出来工作，不过要晚一点。车子转弯转得太急要翻车的。小平这个事是毛主席提的，政治局通过留党察看、以观后效的，现在一下子马上出来不行，要一个过程。不然真成了宫廷政变了。

另外，叶帅说，小平晚一点出来，也可以显示华主席的能力。现在粉碎“四人帮”很得人心，但是他在其他方面怎么样呢？还要让群众看一看嘛。

叶帅希望“我们这些老家伙们”帮助树立华国锋的威信。叶帅说，我不说别的，华国锋五十几岁，我们都快八十了，小平也七十多了，选择这个人不容易啊！大浪淘沙，沙里淘金啊！

不过叶帅还是说，小平晚一点出来，总要出来的。他说，你看，（华国锋主持正在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反原来的编辑方针，原来凡是涉及、讲到刘少奇、邓小平、林彪好话的地方全删；现在反过来，凡是讲邓小平好的地方，一概不删，保留。保留了十几处。将来大家看了，知道毛主席赞扬过他。这其实都是在为邓小平复出做铺垫啊！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  
（作者为新华社高级编辑）

□ 《炎黄春秋》 2008年第10期

~~~~~

## 【荒唐岁月】

###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

• 徐秋梅 • 吴继金 •

在中国历史上，制作发行毛泽东像章曾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也很漫长。“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铸造毛泽东像章的鼎盛时期，所造数量约占到总量的90%。

在毛泽东像章的制作中，中国人民倾注了最丰富的艺术想像力，从材质到图案形状都千姿百态。在那个缺乏艺术的年代，像章制作凝结了全体中国人的心血结晶，人们充沛的艺术激情也只有在这个天地里才能自由驰骋。

#### ◇ 毛泽东像章的溯源

毛泽东像章生产制作的历史，大约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全国解放前；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三是“文化大革命”时期。

第一枚毛泽东像章是1932年上海中共秘密组织为祝贺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政府主席而特地制作的，现在普遍认为这是毛泽东像章的“源头”。

第二枚出现在1943年，制作者是新四军秘密工作者虞廷萃。1943年冬天，日本侵略军扫荡新四军浙东根据地，抓走数十名群众，其中就有虞廷萃，日军后来将其杀害。他的堂弟虞常卿在收验烈士遗体时，在其身上内衣中发现一枚木质的毛泽东像章，直径大约为3厘米，毛泽东像为人工画刻，比较粗糙，但却是极为珍奇的孤品。

第三枚出现在1945年，制作者是我国著名电影导演凌子风。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前夕，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们特意制作像章赠给七大主席团成员。这种像章体积不大，直径有2.5厘米，由纯白锡灌铸而成。像章后有别针，可佩戴身上。像章装在一个小方木匣里，木匣上有用毛笔书写的小字：“献给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匣上涂有桐油，光泽美观。匣内贴着红布，衬托着银色的像章，十分耀眼。凌子风曾搞过雕刻，他在砚台背面用小刀雕铸模子，将锡质香炉和酒壶熔化浇铸在砚台上，待冷却后取下来就成为银白色的毛泽东像章。解放后，陈毅之子陈昊苏曾将其收藏的一枚此类像章捐献给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党史陈列室珍藏。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制作了少量毛泽东像章，约占已知存世毛泽东像章总量的10%。多数是商店或全国性机构为了纪念活动而制作的。按时间先后主要有以下一些：

1950年，上海著名的“老凤祥”银楼，为了表达对共产党、毛泽东的感激之情，制造了少量的22K金质毛泽东像章，这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金质毛泽东像章。

1951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制作了铜质毛泽东像章。该章正面有“抗美援朝纪念”字样，以圆形加五角形为边，直径5.6厘米。

1952年，国营上海金店为纪念毛泽东六十寿辰而制作了22K金像章，同年上海还生产过银质毛泽东像章，画面为毛泽东侧身浮雕像。1953年2月10日的上海《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金银饰品店制作的银质毛泽东像章出售广告，每枚售价为旧人民币4000元。此外，上世纪50年代初，国营成都金店曾制作过20K金、4克重的五角形毛泽东像章，上面还刻有编号。

#### ◇ 毛泽东像章的泛滥

“文化大革命”中，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制作毛泽东像章的狂热达到了顶峰。“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毛泽东像章是1966年底由上海联合徽章厂首先推出的。图案取自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的形象，直径1.2厘米，红底、金像、圆形、铝制。随着这批毛泽东像章的出现，像章热很快风靡全国，全国各地即刻掀起了抢购狂潮。

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各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像章生产组织化了，像章的种类更加繁多。上至中央机关，下到工厂科室，都成立了像章使用、发行单位，全国各大中等城市都有毛泽东像章办公室。毛泽东像章发行单位之广、面世数量之巨，制作品种之多，都堪称世界之最。天津一家军需工厂，在1966年的毛泽东像章生产量超过10万枚；安徽合肥一位科技人员称经他一人电镀过的毛泽东像章就不下200万枚。1967年5月，中央军委决定，由总政治部制作图案、将戴红领章的毛泽东侧面头像和录有毛泽东手书“为人民服务”的纪念章发放全军官兵。这股热潮直到1970年才稍有降温。

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像章佩戴率很低，1967年像章佩戴率是59%，1968年上升为89%，1969年达到高峰，为94%，几乎全民皆“戴”了。从1970年起，降至72%，1972年为10%，1974年后就很少有人戴了。据估算，仅1966年5月到1968年8月间，全国约有2万多家工厂共制作毛泽东像章和语录章达80亿枚以上。

“文化大革命”中最后一批毛泽东像章是在毛泽东逝世后制作的。像章正面是毛泽东头像，背面印有“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1976.9.9”。

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这些像章的制作和工艺越来越讲究，用最好的原材料，由水平最高的模具师开模制作，在生产过程中被当作最重要的头等政治任务来完成，用巨大的心血来体现对领袖的忠诚。

#### ◇ 毛泽东像章的狂热

观察“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就好比收藏了一部文革史。这些像章中反映了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如“炮打司令部”、“一月风暴”、“吐故纳新”、“九大”等等。这些像章既记录了历史的片断，也承载了一代人被动狂热后的无奈，凝结了一个时代的巨人情结。

1966年10月12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两封边防战士希望得到像章的来信，在社会上立即引起了轰动。各地的红卫兵和各界群众纷纷把自己的像章割爱寄给边防战士。他们在信中写道：“我们热爱毛主席像章，看到战士们只有一枚像章，执勤的时候轮流戴，我们被你们的精神感动了。我们决定把在北京得到的像章和领到的毛主席语录寄给你们，表达我们的一片心意。”

包头钢铁公司一位青年看到《人民日报》上边防战士的来信后，暗自下了决心：只要有一枚毛泽东像章，就寄给他们。10月16日，他果然得到了一枚毛泽东像章。年轻人在胸前戴了3个多小时后，依依不舍地把像章摘下来寄给人民日报社，请报社代为转交。他在信中写道：“编辑同志，请赶快把这枚纪念章转给边防战士，快！快！”

同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像章送达边防哨卡的情形：白雪皑皑的昆仑山中，某部战士扛着语录牌、毛泽东画像，列队迎候送像章的专列。这是一个神圣的礼仪。等呀等，一直等到天黑都没有见到专列的影子。这时人们才恍然醒悟，原来是激动之余，把专列抵达的时间搞错了，专列要到次日才能到达。第二天晚上9时，在风雪中点着松明子、打着灯笼盼了好久的战士们终于看到了专列。山谷沸腾了，欢呼声、跳跃声、锣鼓声响成一片。战士赵培田、王振亚、李书田是最先给《人民日报》写信要求得到像章的3个人。赵培田为了接受毛泽东像章，走了115公里路，翻山过河，一天半的时间只吃了两餐，其他二位也是从百里外赶到的。当部队领导把像章别在他们胸前，三名战士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竞相佩戴像章，数目由少到多，型号由小至大。那时，生活比较艰苦，可人们宁愿忍饥受饿，也要买上一个像章，春风满面地别在胸上。那个年代，毛泽东像章种类极多，大的、小的、铜的、瓷的……有些狂热分子，为了集齐像章，竟至于倾家荡产。戴像章成了亿万人追捧的时尚，有人把它别在裙摆上，有人把它扣在帽檐上……一些人为了表明对毛泽东最忠诚，竟将它别进了肉里，然后得意地把伤口展览给他人看。

#### ◇ 毛泽东像章的分类

毛泽东像章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时间跨度也很长。下面略作介绍。

万岁章毛泽东像章图案中有不同的毛泽东正、侧、头、半身、全身像，另附加各种字体的口号式大字，如“毛主席万岁”、“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四个伟大（即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万岁”、“九大万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等等。

历程章像章图案中有毛泽东革命实践主要历程的图案，如“日出韶山”、“南湖建党”、“安

源朝阳”、“八一枪声”、“星火燎原”“井冈火炬”、“遵义红旗”、“万里长征”、“延安宝塔”、“百万雄师”、“天翻地覆”、“六亿神州”、“五洲震荡”等等不胜枚举，还有将数个历程图案同铸在一枚像章上的。

诗词章像章图案中有毛泽东诗词中的诗意图案，有的同时附相应的仿毛泽东手书，如“红军不怕远征难”章是雪山草地图案，“天翻地覆慨而慷”章则是天安门前红旗升的图案，“梅花欢喜漫天雪”章则是梅花图案。

语录章像章中有毛泽东语录，字体各异，内容如“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革命委员会好”、“炮打司令部”、“要准备打仗”、“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为人民服务”、“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等等。

敬祝章、“忠”字章像章中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或“三忠于、四无限”（即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无限敬仰、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无限忠诚）的字样等，图案除有毛泽东肖像外，多采用葵花、红太阳、毛泽东的革命历程等，取意“葵花朵朵向太阳，战士心向毛主席”。

样板戏章“文化大革命”中，八个样板戏风靡海内外，这类章多冠以“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为领头章，下分“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革命现代京剧—奇袭白虎团”、“革命现代京剧—海港”、“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革命现代交响乐—沙家浜”、“钢琴伴唱—红灯记”等各种图案。

庆祝章此类章是以庆祝、欢呼某一句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公开发表，或某个大会的胜利召开等为内容，如党的九大、某单位的代表大会、毛泽东和林彪接见红卫兵“一月夺权革命风暴胜利”、“毛泽东视察”、“革委会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等等，凡是可庆祝欢呼的皆有制作。

套章当时29个省市自治区、各军兵种、各部委办、各院所及单位都纷纷自制铸有本单位名称（也有不铸本单位名称的）的系列成套毛泽东像章，如外贸部套章10枚，武汉重型机床厂毛主席视察纪念套章6枚，三机部庆“九大”敬祝编号套章15枚，背铭文“永远忠于毛主席”套章22枚等等，最多者一套59枚，是由江西景德镇制作的陶瓷章。

外文章毛泽东像章中有一特殊版别，即是背铭外文，有英、法文等，内容多以时兴口号为主，或铭铸造地如“中国南京”、“中国上海”或铭长征历程等等。

海外章“文化大革命”中，香港、澳门各界同胞制作了多种毛泽东像章，也多是万岁、敬祝、忠字、庆祝之类。只是从背面的铭文可辨别出自港澳。此外，我国援越抗美部队曾用美机残骸制作过毛泽东像章。还有人收藏有背文“日本？东京，东方轮船公司1970”字样的毛泽东像章。

#### ◇ 毛泽东批示制止

1969年3月23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做的报告中，特别强调“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思想”。他说：“已经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我看是城市多于农村，高级干部多于一般干部，一般干部多于群众。”“城市的干部家里有毛主席像章一百多个，《毛主席语录》十几本，这不是浪费吗？”“现在许多地方出的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上海做的特别大。物资部已经发了5000吨铝，都要收回来！毛主席像章已经做了

22亿枚，我国有7亿人口，平均一人有好几枚，但现在的情况是，有的人还没有，有的人有几百枚，很不平衡。”“有的人一天换一个，天天换，珍贵就不珍贵了。光求外表好看，这是形式主义，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要来一个献像章、献语录的群众运动。一个人放着十几本语录不用就是没有实效，实效变成了失效。原来要求人手一册，不是人手几册，现在讲究哪个厂出的，哪个地方出的，净从形式上去挑。还有拿语录和像章送礼。”“宣传毛泽东思想要讲实效，有人身上挂了很多像章，甚至挂满了像章，不吃透毛泽东思想，像章挂得再多也不能变成物质力量。”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69年6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文件。毛泽东亲自在这个文件上批示“照办”。文件指出：“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宣传毛主席形象、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上，有些时候，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追求形式和浮夸浪费的问题。为此，特提出如下改进意见：一、各级领导要积极引导群众，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搞好思想革命化，不要追求形式，要讲究实效。二、重申中央1967年7月13日《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今后，塑造毛主席像，必须严格按此指示执行。三、不经中央批准，不能再制作毛主席像章。四、各报纸平时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头画。五、各种物品及包装等，一律不要印毛主席像；引用毛主席语录也要得当；禁止在瓷器上印制毛主席像。六、“忠”字是有阶级内容的，不要乱贴滥用；不要搞“忠字化”运动；不要修建封建式的建筑，如有，应作适当处理。七、不要搞“早请示、晚汇报”、饭前读语录、向主席像行礼等形式主义活动。

《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文件的下发，对于制止包括毛泽东像章在内的有关毛泽东美术宣传品的泛滥无疑起了重要作用，对“文化大革命”后开始盛行的狂热的“个人迷信”宣传活动无疑起了降温的作用。

198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几个问题的指示》中规定：“毛泽东像章要大量回收利用，以免浪费大量金属材料。”1982年11月1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的《文物保护法》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毛泽东像章列为现代文物。

进入90年代，毛泽东像章被列入我国十大收藏品之列。全国各大城市的收藏品市场上，毛泽东像章的交易量和交易额都很大。

□ 《党史纵览》 2008年第9期

~~~~~  
【史海钩沉】

“文革”重灾之下的昆明军区

• 尹家民 •

“文革”中，昆明军区是全国受灾最重的单位之一。其中除了受迫害自杀的昆明军区前任第一政委阎红彦上将，被刺杀身亡的昆明军区后任第一政委谭甫仁中将，受迫害跳楼未死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朱家璧少将等之外，昆明军区的众多将军包括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中将，昆明军区第二政委李成芳中将等，几乎全卷入了“文革”的漩涡。

◇ 阎红彦对“文革”不理解，很快就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黑名单



1966年“文革”爆发后，和许多正直坚定的共和国将领一样，阎红彦对突如其来的“文革”一直处于“不理解、不积极、不得力”的状态，但又不能不执行“最高指示”。他的内心充满了苦闷。1966年8月，在北京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一天晚上阎红彦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房间串门，一股脑儿将自己的看法倒出来。廖志高颇有同感，随着他的话不住点头。最后，阎红彦对廖志高说：“我们应该向毛主席反映，文化大革命不能这样搞，既破坏了生产，又破坏了社会秩序。这哪里叫革命嘛！”

廖志高十分赞同：“是呀，不讲不行了，抄家、破四旧，整死了多少人！”

阎红彦请廖志高第二天在小组会上讲一讲，廖志高推辞道：“还是你讲。你的看法比我清楚。”

阎红彦不是不想讲，他有顾虑，他说：“你是知道的，我这个人像彭老总说的一样，是莽张飞，只有其粗，没有其细，说话爱激动，容易坏事，还是你这个知识分子讲好一些。”

第二天，廖志高讲后，阎红彦憋不住，也讲了起来。他们对“文革”的担忧，引起了与会者的共鸣，同时也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阎红彦私下对夫人王腾波说：会议期间，曾组织他们去参观了一次北京大学批判工作组的大会。会上批了一个军长，江青公然气势汹汹地叫那位军长“站起来”。说到这里，阎红彦气愤地说：“她有什么资格叫一个军长站起来！”他还不止一次地当着王腾波和省委书记处书记郭超的面说：“林彪的报告，我就是听不进去，一句都听不进去！”

10月初，阎红彦接到通知，要他去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中央工作会议从10月9日开到28日。主要针对全国各地遇到的强大抵制与阻力，重点解决各级领导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要求“必须转变立场”、“跟上伟大战略部署”；“到群众中去”、“紧紧掌握斗争大方向”；“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阎红彦糊涂了，他真不知道眼前的“革命”到底要怎么搞。他反复阅读报告、“讲话”，还是理不出个头绪。

会议期间，江青、陈伯达专门召开了一个小会，指定一部分高级干部，特别是原来在军队工作的高级干部参加，鼓动大家揭发批判邓小平，为打倒邓小平造舆论，凑材料。阎红彦和时任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的赵增益作为第二野战军三兵团的老干部，被通知参加了会议。

会上，有一个职位很高又是邓小平的老部下的人，“揭发”说：“邓小平在淮海战役中动摇，企图后撤。”

不料，此人话音一落，阎红彦就立即站出来，激动地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这件事。整个淮海战役期间，中野总部一直是随我们三纵行动的，邓小平一直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阎红彦指着坐在身旁的赵增益：“你是当时三纵的作战部长，你说说，你知道不知道？！”

赵增益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知道。”

在场的江青、陈伯达气急败坏地看着阎红彦，会议只好草草收场。但是很快，康生就把阎红彦正式列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

中央工作会议后，11月初，阎红彦回到昆明便陷入困境。“打倒阎红彦”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声讨、控诉大会一个接着一个。当时阎红彦已是近60岁的人了，又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批斗会一开就是一整天，不让他吃不让他喝，不让他休息。即便如此，阎红彦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是什么“三反分子”，在造反派要他对被打倒的某个干部表态时，他总是说：“他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主要责任在我，欢迎同志们批评。”引得造反派头头大骂阎红彦“老奸巨猾”：“什么时候了，还在为干部树黑样板！”

◇ 秦基伟对造反派搞“蘑菇战术”，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民脖子被斗骨折

斗争激烈的时候，昆明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一致举手通过：“保护阎政委。”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对“文革”一开始就不理解，对造反派的做法看不惯。他曾在一次省委会上提出了“大拖小顶”的方针。他说：“大拖就是在大的方面拖时间，搞‘蘑菇战术’，一旦政治气候变化，再来‘秋后算账’。小顶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抓住造反派的‘小辫子’，整一下。”他责成负责内保工作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负责阎红彦的安全，而且要“绝对负责”。安排情况要随时向他报告。

秦基伟等军区领导成了众矢之的，军区大院也不得安宁，就想找个地方住宿和开会。秦基伟和军区其他常委躲到空军昆明指挥所（简称昆指）主任刘懋功的家。这里虽然条件简陋，但能够正常工作，保持与部队沟通，保证了云南国境线防务工作的正常进行。

过了两天，云南省军区几百名造反派不知怎么得到了消息，到昆指院子外面吵闹，要揪斗“军队走资派”，被昆指机关干部战士顶回去了。秦基伟知道后对刘懋功说，这个地方不行，不安全，让另外再找个地方。刘懋功想了想后提出：一是去20公里外的空军西山营房，二是去巫家坝机场，离市区近一点，又有部队保卫，比较安全。秦基伟同意去巫家坝机场。刘懋功用自己乘坐的“红旗”牌轿车把秦基伟送到巫家坝机场，还派了个秘书跟着他，帮助办公，照顾生活。对军区其他领导，刘懋功也派车把他们一个一个地送走了。

1967年1月4日，阎红彦由于长时间被批斗，肉体和精神都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头发昏，血压升高，心脏出现房颤，面色通红。大家都劝他暂时休息一下。阎红彦也觉得疲惫不堪，同意稍微休息一下。

1月4日下午5时左右，阎红彦和夫人王腾波一起，驱车来到了距离市区十余公里的小麦峪。

小麦峪，是云南省军区一个保密的军事设施，有一个警卫团驻扎在这里。周围没有警戒线，很不引人注目。这是奉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之命，专门负责保证阎红彦安全的云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银山特意选定的一个点。从人员的出入，到电话的联系，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所以，连日来造反派在城里闹翻了天，却始终摸不着阎红彦在什么地方。

1月5日，是备受煎熬的一天。清晨，阎红彦一起床，就多次要求秘书电话联系，他要立即到造反派中间去做工作，要他们退出军区大院。

军区领导来电话告诉阎红彦，秦基伟已亲自出面向造反派说明，阎政委和省委其他人都不在军区，要造反派们撤走。他们根本不听，竟把小卖部搬进来，准备安营扎寨。军区已经组

织了代表团与造反派接触。秦基伟强调：“现在情况极为复杂，工作由军区来做，阎政委千万不要来。”

阎红彦耐着性子熬到天黑，他还是决定叫王腾波回省委，他和周兴去军区大院，力图通过说服，扭转混乱局面。可是省委办公楼被造反派占领了，门上、窗上、走廊里，到处都贴满了“砸烂黑省委”、“打倒阎红彦”、“批判保皇派”等大标语。省委书记们被冲散了。

周兴当面去做工作，但谁也无回天。当晚，阎红彦和周兴只好又返回小麦峪。

1月6日，阎红彦的家被抄了。当天上午，赵健民正在书记处办公楼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忽然得知造反派要来揪阎红彦。

赵健民立即宣布：“你们都走，我一个人留在这里。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阎红彦逼出来不可。”

省委书记、常委们立即行动，按照赵健民的意见，很快离开了会议室。赵健民一个人留下来抵挡。

造反派大队人马，开着宣传车，直奔书记处办公楼而来。

赵健民从窗子里看到造反派爬墙而入，立即叫人把门打开，挺身而出，迎了上去。

造反派气急败坏，抓不到阎红彦，就将赵健民推上卡车，带到了昆明军区大院。

造反派集中力量逼着赵健民带他们去找阎红彦，被赵健民断然拒绝：“阎红彦是第一书记，我是书记，我怎么知道阎红彦在哪里？阎红彦在哪里，我知道也不告诉你们。”造反派群起而攻之。赵健民又说：“你们批判省委和阎红彦的缺点错误，不应该进驻军区大院。昆明军区是边防军区，是解放军的领导机关。你们用冲击军区这种手段逼迫阎红彦，我不赞成。你们撤离军区大院，我就让阎红彦来同你们见面，参加你们的大会。”话音刚落，造反派就大吵大闹，呼喊：“打倒李井泉！”“打倒阎红彦！”“打倒赵健民！”

造反派头头利用赵健民的话煽动群众，把早已准备好的高帽子，强行戴到了赵健民头上。赵健民伸手便把高帽子扯下来，撕掉了。他瞪着造反派，两眼冒火，大声抗议：“我是共产党员，省委书记，本届中央候补委员！你们这样做是对共产党的侮辱！”

赵健民在汽车上奋力反抗，撕毁了六顶纸糊的高帽子。造反派们哪里肯依，几个人一齐动手，反扭赵健民的胳膊，卡住他的脖子，不让他说话，硬按在汽车顶的行李架上，沿昆明市主要街道，游行示众达3个多小时。

回到军区大院的赵健民，已是气息奄奄，被送进了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检查治疗。夜里，省委卫生所的医护人员，又把他抢出来，送到昆明军区总医院。经检查发现，赵健民的脖子已骨折。造反派不相信，要求自己派人检查。医院拒绝后，又进行了反复检查，结论依然是骨折，需要住院治疗。

1月7日一大早，造反派把大队人马开到了云南省军区，硬逼着省军区领导立即交出阎红彦。直到云南省军区政委张力雄亲自出面，以38年党龄和省军区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保阎红彦不在省军区，造反派才快快离去。

◇ 陈伯达打电话相逼，阎红彦服安眠药自杀

1967年1月8日，是阎红彦到小麦峪的第四天。凌晨1点多，秘书叫醒了阎红彦，告诉他：“省委副秘书长王甸转来陈伯达的电话。”阎红彦立即起床，一拿起话筒，便听见对方气势汹汹，满口的福建土话。阎红彦不能完全听懂他说些什么，但听得出是一种斥责的口气，十分反感，气愤地说：“我听不懂你的话！”

陈伯达就让汪东兴当翻译、转达他的话：

“你们要到群众中去，不要怕群众，你不要像老鼠一样躲在洞里，去见见革命群众嘛！你的命就那么值钱？你没有了命我赔你一条命！我可以给你立个字据。你不要胆小，不要养尊处优。当老爷当惯了，见不得风雨。斗个一次两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这就是中央的意见！”

阎红彦极为不满地说：“我怀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讲话！我就不承认你是中央首长。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你们坐在北京，只知道乱发号令，了解不了解下面的情况？你们对云南的经济建设怎么看？对边疆怎么看？你们究竟想干什么？把地方领导机关搞成这个样子，怎么领导？你们这样干下去，是要出乱子的！”

陈伯达说：“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说得明明白白的嘛，你还怕出乱子？！要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泽东思想领导。你这么害怕群众，难道要毛主席出来为你保命？”

江青也在电话里斥责阎红彦。

“我们又不是怕群众。”阎红彦心头在剧烈地颤抖，实在平静不下来。他推开周兴的门，激动地谈了刚才发生的一切，并要马上进城去，到军区大院去，跟造反派讲理去。

周兴劝阎红彦：“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么用！还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阎红彦回到自己的房间，心绪难以平静，拿起桌子上放的一杯水，一饮而尽，熄灯休息。

凌晨4点多钟，一阵隆隆的汽车声打破了小麦峪的寂静，打听到阎红彦下落的造反派，开着好几辆大卡车，朝小麦峪冲来。

门卫通过紧急电话报告：“造反派冲进来了！”

秘书接完电话后，立即跑进房间，催阎红彦：“赶快起床！”连喊几声不见动静，就走了。警卫员又进去喊阎红彦时，打开了灯，发现阎红彦已停止呼吸！桌子上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腾波：我对不起你，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难过。”

1月8日早上8点多，昆指主任刘懋功突然接到秦基伟的秘书从巫家坝机场打来的电话，说阎红彦同志死了，秦基伟叫派人去查清是怎么死的。并告诉刘，秦基伟同志痛苦不安，眼睛都哭红了。刘懋功立即派气象处长刘星启带人去看，但他们到西山筇竹寺前被群众组织拦住，坚决不让过去，只好回来了。刘懋功又派通信处长王友忠和军务处长赵炳彦去，王友忠对群众组织说要去龙潭街空军部队执行任务，必须放行。造反派看他是空军的，就放行了。他俩回来报告说：“阎政委住在警卫团，死在他睡觉的床上，穿着整齐，从外表来看，没有任何被打现象，脸和手上均无外伤，不像被打死的样子。找不到与他同住的妻子王腾波同志。省长周兴也找不

到了，但他茶杯里的水还是热的。看来刚走不久，不知去向。”刘懋功立即将情况向秦基伟作了报告，并同时报告了北京。周恩来很快就打电话给刘。刘不在，电话是昆指副主任朱刚接的。周恩来说：“要用冰块把阎红彦同志的遗体保护好，北京马上派法医前去检查。”朱刚找到刘报告了周恩来的指示，刘立即照办。当天下午，北京派的法医和刑侦人员乘飞机赶到昆明。由朱刚到机场迎接，并陪同他们前去。经尸体检查、解剖，在胃里发现大量安眠药，大约有1瓶之多，还有25片没完全化开，结论是服安眠药自杀。

陈伯达不肯承认是他逼死了阎红彦。在1967年3月9日的军级干部会议上，在康生讲完话后，陈伯达讲起“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但很快把话题转到阎红彦身上，为自己辩解：“很多同志同刘邓路线划清了界限。但是还有些同志不是很容易划清界限的。有的人，是一小撮人，还要为刘邓路线服务，阎红彦就是这样，是一个典型例子。事实上他并没有受谁的逼迫。有一天晚上，我们听说昆明有一批学生冲昆明军区，目的是找阎红彦辩论，这时我们出于好意，打了个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我问他，你是阎红彦吗？ he说是。因为我普通话说说得不好，一边说，一边请汪东兴同志代讲，请他出来见一见群众，不用怕，没有什么问题。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与昆明学生从来不认识，没通什么消息，也没有什么往来，我们只是根据大局来判断，任何一个领导人，只要站出来与群众谈心，什么问题都好办，就是这样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根据毛主席思想，群众路线，毛主席教导的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和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十六条精神。就是简单的几句话，他说是我们逼死他，给我们安了好大的罪名。他写了遗书，不交给别人，交给他老婆。他不请我们原谅，不请群众原谅，请他老婆原谅。这次简报上有的同志问，阎红彦是怎么死的？我说了这几句话，汪东兴同志还在，这怎么能说逼他去死？这是他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不愿向无产阶级屈服，不愿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屈服，事实就是这样。”

秦基伟被周恩来派飞机接到北京仍被造反派搞了“喷气式”，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被打成“滇挺”总司令

阎红彦一死，昆明更是大乱，军区造反派对秦基伟的批斗也更加升级。北京传来贺龙被打倒的消息后，秦基伟又被扣上了贺龙“黑干将”的帽子。造反派提出：不把秦基伟打倒，誓不罢休。很快，秦基伟的家被抄。

在这种情况下，秦基伟不仅无法工作，就连住在军区大院也不可能了。他带上几个参谋，到了市郊干海子的炮四师驻地暂住，工作靠打电话与在军区的领导同志联系。

过了一段时间，秦基伟等领导回到了机关，仍是不断受冲击。秦基伟还被军区造反派罚跪、批斗，使他无法工作，安全也没有保障。叶剑英得知情况后，向周恩来作了报告。周恩来于1967年春节刚过就派飞机到昆明，以治病为名接秦基伟到北京保护起来。事前，刘懋功接到周恩来秘书电话，告诉他北京来一架飞机，停在昆明军用机场，专门接秦基伟到北京，要刘懋功立即把秦基伟找到并负责送上飞机。

刘懋功和部下费了很大的劲，通过昆明军区其他领导才打听到秦的暂住地点。这时，秦基伟也得到了消息，打来电话，问刘懋功是否接到了周恩来秘书的电话，刘回答接到了。秦基伟让刘懋功马上派车去接他。刘问秦能否自己坐车过来，秦说不行，坚持要刘派车去，而且车要直接开到他的住处门口。刘就派了一辆车去。

车刚开到门口时，秦基伟已准备好了，一步就跨到车里。刘懋功另派昆指副主任朱刚坐了一辆车在后面跟着，以防万一秦基伟被群众组织劫持时，有个线索。

到机场后，刘懋功说：“秦司令，离起飞还有好几个钟头，机舱里面冷，到招待所去休息一会儿，搞点饭吃。”秦基伟说不吃饭也行，还是坐在机舱里吧。刘懋功就叫飞行员把饭菜送上飞机，让秦基伟吃一点。到晚上，飞机起飞了。

到北京后，秦基伟等人被安置在京西宾馆。

来北京的最初一段时间里，上面还通知秦基伟参加过一两次军委召开的会议，后来他就完全“靠边站”了，看不到任何文件，听不到任何报告，成天无所事事，他感到非常苦闷。

到了1967年夏天，全国各地的造反派组织几乎无一例外地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派仗打得难分难解，许多造反派组织都要找一些领导干部以壮声势。住京西宾馆的“靠边站”的干部中，也有造反派找上门来的。秦基伟一开始就很明确：必须坚持党性原则，不介入任何派性斗争。后来，云南某派组织也派人两次找他，希望他站出来，公开表态打倒×××，说×××在“文革”中做过对不起他的事，秦基伟都明确地拒绝了。

1968年1月，云南大理地区连续发生大规模的武斗事件。到了2月13日，中央领导接见云南代表，康生竟然跳出来宣布某群众组织是“反革命匪帮的典型”，江青更是信口雌黄：“事物走到对立面，那没有办法了，要剿匪了。”就在他们的话下，某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匪帮”，被编造强加一个“滇西挺进纵队”之名而剿了。

“滇挺”事件，后来被进一步说成是“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扩大了打击面，不断在“划线站队”中抓“滇挺”分子。在省级机关各系统和13个专区、州、市，54个县（区）的“划线站队”中，掀起了抓“滇挺分子”的高潮，后来荒唐到把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陈康打成了“滇挺”的总司令。

不久，北京又出现了所谓的“杨、余、傅事件”，在一片“打倒杨、余、傅”的声浪中，全体“靠边站”人员都让离开京西宾馆，其中的部队干部和宋任穷等过去在军队的干部被安置到了位于东城海运仓的总参第一招待所。

住在这里也不太平。一天，昆明军区某造反派有几个人来海运仓找秦基伟，逼他揭发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的问题。秦说：“我和鲁瑞林同志工作上配合得很好，未发现他有什么问题。”

“你谈他的历史问题。”来人喝道。

秦基伟说：“他的历史归组织上审查，我不了解他的历史。”

“你真不了解？”

“真不了解！”

“这里有毛主席像，你敢在毛主席像前发誓吗？”

秦基伟没有多想，直接回答：“我当然敢。”

结果，就在秦基伟刚站起来的时候，两个人从他身后蹿上来，扭住他的一只胳膊往下一压，再把他的头往上一抬，接着，有人赶紧按快门照相。这伙人把照片放大后，带回昆明到处张贴，吹嘘他们在北京斗了秦基伟，让秦基伟坐了“喷气式”，从而捞取政治资本。

1969年秋天，秦基伟这些“靠边站”的干部都被疏散出北京，被安排在洞庭湖边一个劳改农场劳动。

1973年4月28日，秦基伟乘火车抵达北京，仍然住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第二天，秦

基伟等人就收到了五一劳动节的游园请柬。

五一劳动节后，秦基伟的名字见诸报端，秦基伟的一些老战友知道他被“解放”了，都主动来探望。这些战友都是“文革”中受过摧残的，大家大难不死，还能相见，都感慨万千。

1973年7月28日，秦基伟被任命为成都军区司令员。很快，他就奔赴成都，开始了新的征程。

◇ 毛泽东要谭甫仁不做“吴三桂”，谭甫仁如日中天时却神秘遇害

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自杀”，司令员秦基伟“失踪”，第二政委李成芳，被诬为“薄一波路线的黑爪牙”，也被造反派揪斗。武斗由枪战发展到炮战，甚至把军工企业研究试制的尚在保密阶段的新式武器，也抢来用于武斗。云南局势越来越恶化。中央迅即采取措施，周恩来多次针对云南情况，作了指示。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便是一项重要举措。中央紧急开办云南学习班，谭甫仁进入决策层视野。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谭甫仁，早年投身革命，参加了南昌起义、平型关大捷、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万山群岛等许多著名战役、战斗，历史上功勋卓著。新中国成立后，谭甫仁先后担任过军政委、广西军区第三政委、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等职，发现和培养了名扬军内外的“硬骨头六连”这个先进典型。他思想敏锐，具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

1968年1月24日，谭甫仁奉命来到“云南班”并担任“学习班”办公室主任。2月11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听取了各省和军队办学习班的情况汇报。周恩来首先谈了“云南班”的情况。当毛泽东听说云南已来了800多人时，便摇头说：“不行，800人少了，要增加一倍。”“云南班”云集北京的学员遂达到2000余人。随后，昆明军区亦在北京举办了4批有3000名军队干部参加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毛泽东提出扩大“云南班”后的两天，在中共中央的敦促和帮助下，由谭甫仁等主持，云南两大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的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的协议》。混乱的云南局势得到了遏制。

2月11日后半夜，谭甫仁突然接到通知，毛泽东紧急约见他。谭甫仁忐忑不安地走进人民大会堂118号房间，毛泽东见他进来，就放下捧着的线装书，详细地问起谭甫仁的情况，然后和他谈起了吴三桂做平西王永镇云南、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教训。

最后，毛泽东转入正题道：“你要做‘平西王’了，执掌云南边地，封疆大吏哟！”毛泽东饮过一口茶，向谭甫仁传递了中央的想法：“中央已决定你担任昆明军区政委，名已正，言已顺，把云南班、昆明班办好，积累的问题解决掉，卸掉了包袱，再回云南。”1968年5月19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任命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政委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政委。6月17日，中共中央又批准谭甫仁担任昆明军区党委书记。由于要在北京办好两个班，故推迟上任。6月底的一天，周恩来又在中南海约见了谭甫仁，再次对云南问题作了指示。从此，谭甫仁正式主持云南全面工作，并直接领导正在北京举办的“云南班”和“昆明班”。1968年8月11日，谭甫仁和“云南班”的代表们乘飞机，从北京抵昆明，正式上任。

“谭办”秘书周孜仁总结道：谭甫仁上任伊始，旋即猛砍三板斧。板斧一就是“划线站队”，即将两派群众组织之一派明确定义为错误路线而广为整肃之；板斧二就是“围海造田”，即将滇池水域围填三万亩以大办农业并以粮为纲；板斧三就是“修‘万岁馆’”，即将“文革”前落成不久的工人文化宫或炸或拆，一夜之内夷为平地，以迅速修建“毛主席万岁展览馆”。板斧落下，

短短时间，谭甫仁在云南的威望便蒸蒸日上。

1970年11月，云南召开全省第二届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简称“学代会”，因该届大会代表人数逾万，故又称“万人大会”）。谁也没有料到，就在万人大会闭幕后第三天，谭甫仁却被暗杀。暗杀发生在12月17日凌晨4时50分左右。

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指示昆明军区副政委周兴：“1．要组织抢救。2．案子很可能是内部人干的，要抓紧时间破案，重点是军区机关内部；成立专案组，由你负责，公安部派人协助。”记录完周恩来的指示，周兴又给军委总参谋长黄永胜报告了情况，黄永胜在电话中指示：“抓紧抢救，北京总医院将很快派人去。”接着，昆明军区党委常委会紧急召开。

昆明军区除省委常委外，军区司、政、后三大部的负责人也列席了会议（当时，司令员秦基伟被秘密关押，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王必成在北京治病，副司令员鲁瑞林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他们均未出席这次会议）。常委们都是身经百战的将军，但对在军区首脑机关发生这起罕见的恶性案件，都感到十分震惊，一时也拿不出什么主意。最后，周兴稳了稳情绪，提出：除了责成军区总医院进行全力抢救外，主要的任务是：1．抓紧破案，发动群众提供线索，查找蛛丝马迹；2．查枪、验枪；3．找现场人员了解情况；4．成立“谭甫仁、王里岩被害案侦破小组”（简称“017专案组”，新华社播发的唁电稿时间有误，谭甫仁夫妇被害时间应为17日），由周兴任组长，蔡顺礼、王必成任副组长。

虽经紧急抢救，昆明军区总医院已无力回天。谭甫仁夫人王里岩两眉间中了一弹，实际上已当场身亡。谭甫仁身中两弹，一弹击中腹部，一弹打在头上。入院时，几乎没有血压。后来经过抢救才有了点微弱心跳。腹腔内积满了血，医生只得剖开腹腔放出积血。后又打开胸腔，采用心脏按摩，但收效甚微。

当日下午3时，解放军总医院外科主任鲁维善教授飞抵昆明。他肯定了昆明军区总医院的抢救方案。延至午后4时，谭甫仁终因伤势过重去世。谁也无法想见，一位驰骋疆场几十年，功勋卓著的开国将军，没有倒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却倒在了和平年代凶手的黑枪之下。

据为《中共党史人物传》一书撰写谭甫仁传记的作者说，他从中央档案馆和军委、总政、成都军区档案馆等单位查阅了大量资料，包括案件的侦破和审理记录，终于查明谭甫仁被害的真相：

凶手王自正，原名王志政，河南内黄县人，富农出身，时任昆明军区政治部保卫部保卫科副科长。1946年，王志政曾参与杀害了当地的村武委会主任、中共党员武不会。后来改名混进革命队伍。在部队，他编造历史，伪装进步，入了党，提了干。“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时，王自正家乡的群众揭露了他当年参与杀害我武委会人员的罪行。1970年4月下旬，揭发信几经辗转送到了谭甫仁手中，经昆明军区派人查实后，谭甫仁于5月23日签批了同意对王自正进行隔离审查的报告。

由于王自正是从保卫部保密员的职位上提升为保卫科副科长的，他对军区首长接触机会较多，对其住处及周围情况比较熟悉。当军区专案组突然决定对他进行隔离审查时，他自知难逃严厉的惩罚，便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王自正自杀后，从他留下的3本笔记本中发现他亲笔写下了这样的句子：“不是死刑，也要劳改终身。我的老婆孩子也得受到牵连。我一辈子完了！”“不如杀谭甫仁，影响更大，发泄心头之恨。”

谭甫仁夫妇被害事件在军内外引起了震动。1971年1月23日下午，云南省革委会、



昆明军区在昆明联合举行追悼大会。

因该案发生时正处于“文革”中，极左路线和派性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严重的干扰，致使专案组先后两次改组，侦破时间长达8年半，直至1978年6月专案组撤销为止。谭甫仁被害一案仍然维持了1971年案发当初所作出的定性和结论——谭甫仁夫妇被害属于阶级异己分子王自正的忌恨和阶级报复的动机所为，绝非其他什么原因。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专案组组长蔡顺礼（第一次改组后任）被隔离审查，“017专案组”于1974年第二次改组，上面派来一位同志指导破案。这位同志从想象出发把本案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挂钩，捕风捉影，要查出暗杀谭甫仁的凶手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关系”。结果除了多伤害一些无辜者外，没有获得任何线索和新材料。“017专案组”工作了八年半，其间人事几经变动，最后一位组长是昆明军区副司令员徐其孝。根据军区党委的指示，“017专案组”为昆明军区党委和云南省起草了结案报告，并上报中央。其要点是：杀害谭甫仁及其夫人王里岩的凶手正是王自正；本案的性质属阶级报复，系反革命分子王自正个人作案。保卫部部长景儒林的自杀，系他自感责任重大、“没脸见人”而采取的极端行动，与本案无关。

□ 《党史博览》 2008年第11期

~~~~~  
【当事者说】

我是“二月逆流”会议记录稿的唯一见证人

• 王广宇 •

怀仁堂1967年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即后来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发生后不久，王力整理了一份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经过周恩来等人修改后，王力叫我将这个记录印发下去，大概只印十五份。这件事是王力交办的“绝密工作”，从抄写到排印、发送，始终是我一个人办的，办事组其他工作人员都不知道。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1967年2月16日之后的一个晚上，王力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在场的还有关锋（通常情况下，不管王力还是关锋向我布置工作都是他们俩同时在场）。王力说，叫你办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求很急，要严格保密，一切都由你亲自去办。说着，王力出示了一份有两、三页纸的记录稿和张春桥、姚文元给王力的信。

王力交代说，这是一份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是我同春桥、姚文元回忆追记的，经伯达、总理修改后，现在准备印发有关同志。王力把纪录稿和张春桥给他的信一起给我看（此时张春桥、姚文元已回上海）。张春桥给王力的信中只说，看了王力执笔的这份记录稿，觉得大致就是这样，没有什么补充修改。并嘱王力把这个记录送伯达、总理过目后再发。

我翻看了一下王力执笔的这份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发言记录。记录稿主要是按发言次序记录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叶剑英、徐向前、李富春和谢富治等的发言。记录还有另外参加人，他们是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原记录稿只在开头说“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主持”的字样，但正文中没见有周恩来的发言。我看的这份记录稿是经周恩来、陈伯达看过修改后的稿子，但不记得有陈伯达修改的字迹，只是周恩来亲笔在记录稿上作了几处补充。周恩来的补充字数不多，都是加在发言中间的插话，我印象最深的一处是：当谭震林气呼呼地说：“我不干了，叫你们干吧！”拿起衣服和帽子就要退出会场，这时，周恩来拍了桌子严厉地

说：“回来！坐下开会。”这段话王力的原稿未记，周恩来作了补充，还补充了几处字数不多的插话，内容记不清楚了，记录稿后边署名是张春桥、王力和姚文元追记。

王力向我交代，要我把他亲笔记录的，经总理补充过的原稿重抄一遍，把原稿给他保存，用我抄的稿子去打印。他再次强调排字、校对、打印、发送全过程都由我亲自办。他叫我到记者站印刷厂找一个党员排字，排字、校对完，印十五份后，马上拆版。要排字工人严格保密，印好后按他给开的名单，由我登记发送。

晚上十点以后，我去到记者站印刷厂，这是个临时新建的小印刷厂，是从中办、中联部和《红旗》杂志印刷厂抽调来的熟练排字工人，专为印刷《快报》、《文化革命简报》以及办事组办的几个小刊物而设立的。我找到一位从中联部调来的五十多岁的党员老工人，向他交代这份绝密文件，要他亲自排。在排字车间，只有他和我两个人，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这位老工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全部排完，经我校对后，印制十五份，当场拆了版。

我将排印好的《二月十六日怀仁堂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十五份带回后，向王力汇报。当晚，王力给了我一份他亲自开列的发送名单，大约十来位，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部分参加会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还有没参加那次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江青、戚本禹等。第二天他又补充了几个人的名单。

我记得发完后，还剩下一、两份。王力说，剩下的文件和记录稿（我抄的那份）一律销毁。我当时想，以后万一他再要这个文件就麻烦了，想暂时留一下，就没销毁。我把排印原稿和剩余的几份文件以及发放名单一起装在一个保密袋中，放在我办公桌带锁的抽屉里。直到我8月31日离开中央文革办事组，这套材料都完好地保存在那里。如果后来江青一伙没有销毁它，如果最后中央文革办事组移交人作为重要档案交给了中央办公厅，那么，这套证据应是完整的。

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和相关内容，办事组的工作人员无一人知道，我是唯一的见证人。因为从王力布置这件事的前后看，他是把这份记录稿当成绝密文件处理的，按他的布置，这份记录稿不会轻易扩散到社会，更不可能到红卫兵手里。我作为中央文革办事员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这方面的内容。只是在我被关押在监狱时，中央专案组要求我凡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交办的大小事情都要交代，因为他们做的每件事是阴谋活动。中央专案组逼供后，叫我把这些事都上纲成“三指向”（注：即清查“五一六”时给所谓“五一六分子”定的罪名：把斗争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指向人民解放军）。我照他们的要求做了，这件事的过程我在监狱交代过。

对这份2月16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记录稿，我的印象是，在会上谭震林、陈毅等同志因对中央文革在运动中打倒一切的做法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言词中确有过激之处，比如谭震林要退出会场，陈毅对谭震林说：“别走！跟他们（指中央文革）斗。”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也说了些不满的话，譬如，李先念发言说：“把十几岁的娃娃打成反革命太过分了。”又如谢富治为中央文革辩护，陈毅说，“你谢富治不要和稀泥。”但主要还是对中央文革工作上的意见。作为党内的高层会议，同志间当面提提意见，发发牢骚，这是党章所允许的。即使意见不对，也可以反批评嘛。不知后来是谁把这个会议内容抖搂出来上纲成了“二月逆流”。

我不可能完全回忆起那份会议记录的所有发言，但从一些文化大革命“纪实文学”作品中所披露的发言主要内容看，大体上是不错的。但不准确和张冠李戴的情况也有。我认为把这些流传的东西作为历史的依据是不可靠的，最可靠的是查历史档案的原件。

□ 原载《记忆》第七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